

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

主 编 刘含若

副主编 裴 侗

汤照连

严清华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

主 编 刘含若

副主编 裴 倜 汤照连

严清华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1988 年·哈 尔 滨

责任编辑：李 久 军

封面设计：徐 晓 丽

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

Zhongguo Jjngji Guanli Sixiangshi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理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18.6875·插页

字数410,000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207—00858-9/k·74 定价：5.70元

序

胡寄窗

现代管理科学在本世纪初由美国工程师泰罗创建时，系以车间工人的劳动操作过程之科学化为研究对象，他首次提出的高工资与低成本并存的原理，名震一时。数年后法国工业家法约尔着重探讨企业管理人员的管理职能，提出一整套企业经营管理科学的原则，突破个别车间操作科学化的局限，扩大了管理科学的研究范围。1920年美国学者梯德与米提卡夫合作刊行《人事管理》专著，给管理科学增添了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而更值得注意的还在于三十年代以来哈佛大学的梅奥教授等所倡导的行为主义理论。他们不满足于专事从提高工人物质利益以促进生产效率的传统管理方式，认定工人在追求物质利益之外还具有社会和心理等方面的需要，因而强调从人的行为的本质中激发出动力，让企业中人与人之间和领导与工人间的关系得到调节，才能提高生产效率。于是行为主义的管理观点风靡一时。第二次大战后，西方管理科学在原有操作管理和行为主义的基础上，又吸取新的科技成就如系统论、控制论、决策论以及运筹学等等形成许多新的管理理论和学派。学派有十余种之多。美国通用电器公司把不同种类的原材料和部件的管理归纳成ABC理论；里本斯特因根据个人对商品的款式和价格的不同效应倡为X—效率理论；麻规哥尔提出X—Y理论，X指人们不爱劳动或逃

避责任的天性，Y指在一定工作条件和报酬下的积极工作；八十年代初美国管理科学为了应付日本的挑战，美籍日人威廉大内融合美国式与日本式经营管理之长处又提出所谓Z理论；其他数学管理模式之多更不必说。西方管理科学自1911年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刊行以来，数十年间涌现出如此多的学派和理论，在其他经济理论领域中殊为罕见。

但是，尽管现代国外管理科学的派别和理论甚为繁多，它们均系以各别企业的经营管理为对象的微观经济管理。应该指出，即使整个国家的各个企业均能通过科学的管理以达成各自的最大的生产效率，对整个国民经济来说不一定是好事。因为这样可能造成整个社会生产资源的很快枯竭，社会经济的巨大浪费，外部影响（Externalities）之恶化以及其他不利问题。故在强调微观经济管理之同时，决不能忽视宏观经济管理的意义与作用。在一个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世界而谈管理问题，宏观经济管理可以考虑也可不必考虑，在社会主义国家谈经济管理，从宏观角度考虑的重要性决不亚于微观管理。

近些年来，日、美等国的企业管理专家和学者已开始意识到现代的科学管理原则有其美中不足之处，转而从中国古代文献如《论语》、《孙子兵法》、《老子》及至《三国演义》等古籍中去探索经营管理之道。不论这一努力能否获致广阔而深远的成效，而世界管理科学必须兼领宏观经济管理研究的新动向，却是值得注意的。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虽然也存在一些有文字记载的微观管理经验以及某些尚未加以整理的如山西票号、徽帮等的管理先例，而宏观经济管理的宝贵经验之丰富，则是其他文明国家所难与比拟的。惜乎，正如美国的管理思想史学者克劳德·乔治教授指出

的：“中国人……在管理方面的探索，还很少进行真正的研究”，以致许多宝贵的经济管理文化遗产长期湮没无闻。近两三年在国内外新形势的影响下，我国才掀起一个整理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文化遗产的热潮。这不仅会丰富世界管理科学的内涵，亦将为创建社会主义管理科学提供足资参考的先行思想材料。

本书的著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力求实事求是地发掘和总结我国历史上的经济管理的光辉思想遗产，俾能与现代外国先进管理思想相嫁接，以促进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并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管理科学贡献力量。正确的著作目标将为此目标之实现造成更大的可能性。本书的编写体系，在宏观与微观分析之外兼采德国学者倡议的中观分析，这在同类著作中堪称别具一格，值得向读者推荐。

一九八八年六月

绪 论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它长期形成的异于他民族的特性，由此而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无不打下本民族的烙印。我们环顾世界各国，就是那些所谓全盘吸取外来文化的民族，也从来没有脱离本民族传统中国有的带有恒久的东西。所以吸取外来文化中优秀的成份是完全必要的，但脱离本民族的特性，不但不会根深叶茂，时间一长还会枯萎的。从研究管理思想的角度来说，只有将别国的先进管理经验与本民族的管理思想相“嫁接”，才能行之有效，才能促进本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本书编写的目的，就在于总结我国历史上经济管理的经验，为这种“嫁接”创造条件。

（一）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发展阶段

所谓经济管理，即对经济过程的计划、组织、控制与指挥的活动与制度。

所谓经济管理思想史，既研究某一个历史阶段人们对经济过程的计划、组织、控制与指挥的思想、原则、制度与方案。

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顾名思义，它是研究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政治家、思想家、企业家等关于经济管理的思想、政策、制度与方法。

经济管理绝不是近代的产物，它是与人类同生。人类要生存，首先就要解决衣、食、住、行问题，而人类活动从来就是社会活动，这样即便是在原始社会也会有经济管理的存

在，不管它当时是多么的原始和粗糙。关于外国的原始经济管理思想的状况，我们姑且不论，我国尧舜时代，虽为传说，但从古籍记载亦可以证明此点。《淮南子·齐俗训》中说：“尧之治天下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易·系辞下》中说：“尧舜氏作，……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可见，当时不但在管理生产上因地制宜，教民耕种，而且对管理也在注意之列了。至于到了夏商时代，有了国家机器，其经济管理的性质就更为明显了。

我国经济管理思想史从严格意义讲始于西周，兴盛于春秋，到了战国时代，可以说到了管理理论丛生的时期。这个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它为以后历史上的管理思想奠定了基础，在以后任何管理思想中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它的源头活水。所以我们将这个阶段确定为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的产生与奠基时期。

西周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其特点是封建领主制。它的土地制度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具体制度是井田制。善于农耕是西周高于前代的文明标志。《史记·周本纪》里说，周人始祖后稷“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则之。”到了西周时期农业的管理、技术、产量，从《诗经》的农事诗中看，已非前代可比了。所以在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上第一个出现西周经济管理思想是顺理成章的事。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封建领主制经济向地主经济的转变时期。这个时期重要的特点是生产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铁工具已经使用，牛耕已经出现，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突破领主制的生产关系，其明显表现是“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已成为一个空有的招牌了。各诸侯国已各私其国了。过去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现在成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各诸侯国，为了独霸一方，进而逞雄天下，纷纷变法。在经济上的表现是承认私田，鲁宣公15年（公元前594年）的“初税亩”，晚于它近百年的晋国的按亩征税即是证明。在政治上实行富国强兵之策，招贤纳士，实行改革。魏有李悝，楚有吴起，秦有商鞅，皆出谋画策，以图富强。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正是适应这种政治经济形势而生的。《汉书·艺文志》载：“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这个时期有以伦理为核心的儒家的经济管理思想，以经济干预主义为主的法家的经济管理思想，还有类似于放任主义的道家的经济管理思想，还有既有理论又有一定实践经验的独特的轻重理论。它们都抱着“以其学易天下”的宗旨，而且确实是“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各封建君主因为求其生存，争其发展，对各家是“兼而礼之”。这样就促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它不但促进当时的学术活跃与繁荣，而且对后世有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只要细观中国管理思想史的全貌，就会明显的看到，不管以后的思想家具有多么独创的观点，先秦诸子的思想影响或隐或现的可以在他们著作中找到。

秦汉至隋唐是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与确立时期。在这1100余年中，中国封建的生产方式不断的完善与成熟。秦王朝虽是速忽即逝，但它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所确立的模式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遵循。西汉大一统的政治形势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前70余年的黄老政治，在经济方面属于放任主义，之后武帝50余年由于形势的需要而

实行了经济干预主义。王莽的经济管理思想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而产生的一种超前的变异思想。他施行的很多措施，需认真研究，切不可一笑置之。违背经济规律要受到惩罚，可以说它是一个典型。研究经济管理思想，切忌简单的以成败论人物，这里不只是讨论历史人物的功过，而是研究某一措施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对历史的作用，为后人提供借鉴的。东汉约200年。在光武时期，生产力有一定的发展，之后豪强势力日益强大，土地兼并更为疯狂。在这时期虽然也有一些思想家如荀悦、仲长统提出一些试图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但其原则都是在不动大地主利益的前提下改良，所以多是无法实现的空想。魏晋南北朝时期约400年，战乱不已，朝代更迭，然而在这竞相存在的情况下也有些宝贵的经济管理思想，这就是西晋的占田思想，北魏的均田制及贾思勰的农业管理思想。唐代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以安史之乱为界，前段经济发展较快，出现商邦、商行、柜坊、飞钱等经济现象，这里定有较好的管理措施，可惜无详细记载，难以总结。后段唐王朝江河日下，混乱的经济，呼唤着杰出的管理人材。刘晏、杨炎、陆贽即是应运而生的人物，他们的管理思想自有其时代的特征，因而促进了当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阶段，其时间是从第十世纪的北宋建立开始到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为止，前后将近900年。这是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的发展变化时期。该时期有以下几点特点：君主专制权力的扩大为历史上所未有，君权高于一切，形成“治天下者惟君，乱天下者惟君”的局面；不抑兼并，使土地高度集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明显的反传统的经济思想。

这个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所发表的观点，无不直接或间接与以上该时期的特点有关。

两宋属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但不是衰期。它继承前代的经济与技术成就，又在民族矛盾中生存，所以它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方面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另一个高峰，从哲学上说达到更为抽象的理学阶段。科技上火药、活字版、指南针的发明。天文学上已有世界上第一个关于超新星的文字记录 and 天文图的绘制。在数学上杨辉的开方和秦九韶的三次方程式，都早于西方几百年。在文学上的成就，尽人皆知，自不待言。我国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其言不误。但是从经济管理思想观之，则稍为逊色。被列宁称为11世纪中国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其经济改革方案也逃不出桑弘羊、刘晏的窠臼。但视其思想倾向而言则和传统思想有所不同，他公然认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实际是托古改制“附会经义，以钳制儒者之口”。李觏说的坦率些：认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舍是而克为治者，未之有也”。南宋叶适等人与传统思想公然相悖了，他在本末论上直言不讳的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叶适等人的反传统思想，绝非个人主观臆想，而富有时代的气息。

到了明代，特别是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有明显的增长。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的桎梏着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的腐朽，农民战争的连绵不断，规模波及全国，与此相适应产生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在下列几点以新的姿态作了异乎寻常的论述，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重商思想，为富人辩护；强调土地的私有权。这些思想在丘濬、李贽、黄宗羲、王夫之

等人的著作中都有反映。

以上经济管理思想的变化，反映了15~16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经济因素的变化，资本主义因素增长了，自然反映在思想家的头脑中。假若说丘濬的思想反映了地主阶级中明智分子适应形势的话，那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不论其出身如何，反映市民阶级的呼声则是异常明显的。

中国近代经济管理思想始于1940年鸦片战争，终于本世纪20年代。它是中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向近代经济管理的转变时期。

这个时期庞然大物的清王朝已原形毕露了，腐败无能，不堪一击，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先是商业，后是武力，不断蚕食中国。中国当时各个阶级、各阶层在危机面前都选择自己的道路，提出自己的治国之策。在思想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说通过各个渠道传入中国。这是民族斗争、阶级斗争激烈的时代，也是各种思想撞击的时代。林则徐、魏源是地主阶级开明派中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而首先提出用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代替封建王国是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特别是后期的《资政新篇》，它不是在封建的生产方式中游离，而是向新的方向转变。当然它也反映了小生产者一些天真烂漫的空想。资产阶级改良派是当时一些追求进步的思想家。他们虽然身在地主阶级营垒，但是脸朝着资本主义。他们当时提出的纲领，如王韬的“恃商为国本”，薛福成的“商握四民之纲”，“机器养民”说，郑观应的“兴商务”“习商战”，康有为的“定为工国”等都是为中国寻找出路的进步思想。不错，他们没有抓住根本——封建的生产关系及政治制度的改变，但他们的认识为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深化认识提供了正反两方

面的经验，甚至提供血的教训。他们中的有些人本人就从商多年，所以在企业管理方面还有经验值得借鉴。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在他一生中坚持进步，从不固步自封，他的思想特点是善于创新，从不囿于陈说，在哲学上的“知难行易”说，政治上的五权宪法，经济上的民生主义，都显示出他善于将古今中外的理论融会于一起而独创一格的能力。他在1919年提出的《实业计划》，其宏伟与具体，可以说前无古人，整个计划以发展水路、交通、运输和钢铁工业为核心，就表现出极为卓越的见解，可能他的一些过于具体的设想现在看来有不切实际的地方，但是其基本精神至今还闪烁着光辉。

以上是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发展的大致过程及我们对其分期的依据。

（二）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的基本线索

经济管理不管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总是沿着微观管理与宏观管理这两个基本线索前进的。从世界经济管理思想史观之，多从微观管理开始。据美国管理思想家克劳德·小乔治考证，“管理过程很可能是从家庭组织开始的，以后扩展到部族，最后普及到巴比伦发现的那些正式政治组织单位。……稍后一些，埃及人最先建立了一种分散的分权化组织，很少或没有中央控制。”^①这种说法是可信的，早期的管理，基本上是一种微观管理。古希腊色诺芬的《经济论》实际就是他自己管理与经营的庄园的经验总结。古罗马的贾图的《论农业》也是谈如何管理好农庄及如何物色管家的原则。这就难怪“经济”一词在希腊原意是“家庭管理”了。但是人从

① 《管理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4页。

来是社会的人，而经济发展是不可能孤立进行的，随着分工日细，交换日多，国家的出现与作用的加强宏观管理自然而然就与微观管理相辅相成，齐头并进。从理论上讲，这一基本线索对中国也是适用的，但是由于中国奴隶社会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使这一基本线索在我国变得相当模糊。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是相当精彩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微观经济管理思想由于资料的匮乏而居其次了。中国从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进入封建社会后，到公元19世纪40年代约有3000年的历史，虽然封建的具体经济形态有所变化，但基本生产方式未变，而且在漫长的时间内虽有分裂，但基本统一，特别是秦汉以后大统一的中央封建集权国家的建立，使得宏观经济管理更为耀眼。

这种宏观经济管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直接经营经济。如盐铁专卖，“官山海”，由国家直接控制关系人民生活的重要物资部门和经济资源。

二、依靠政权力量干预经济活动。如“强本抑末”。不管是秦始皇的“上农除末”，还是刘邦的“困辱商贾”，都不是用经济杠杆，而是采争行政命令。

三、用政策指导经济活动。如商鞅重课工商税为“农战”服务，又如晁错的“贵粟”政策，都是利用经济政策引导人们朝国家期望的方向发展。

四、用经济手段调节经济活动。如轻重理论、均输、平准等，都是国家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其他经济规律调节经济活动的例证。

以宏观经济管理思想为主这一基本线索，大致贯穿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这就使某些经济管理思想得到畸形的发展，显得特别发达。如财政思想，很早就提出“量入为出”

与“量出制入”的原则，我们在这里且不对其意义与影响作出评价，单就其言简意赅的高度概括就令人为其天才思想感到惊讶，至今不失其作为财政管理的指导原则。再从赋税的具体制度上说，禹时实行“任土作贡”，之后商周是贡、助、彻法兼而有之，到了秦汉实行田租与口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直到唐初，又实施租庸调法，随着均田制的破灭和经济的发展，又采用两税法，到了明代万历年间张居正总结各地经验又实行一条鞭法，到了清康熙年间又进而实行“摊丁入亩”。这些赋税制度的变化，反映了土地制度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变化，从赋税原理的角度看，向着“至平”，“趣公”、“有常”的方向发展，后者都较前者是一种进步，其丰富多姿为世界财政思想增加光采。再如土地管理思想，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随着人口的增长，使土地问题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终始，所以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层出不穷。董仲舒的限田、王莽的王田、西晋的占田、北魏的均田、直到明清之际王夫之的“有力者治田”、王源的“有田者必自耕”，到太平天国的“平分土地”，其思想的多元化与模式的多样，在世界上也是无与伦比的。由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与人口始终在世界人口中居五分之一的地位，使中国的人口思想与对策在世界上跃居显位，我国人口统计资料之丰富居世界之首。历代的人口政策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紧密相联，当人口众多时，思想家们敏锐的看到其弊并提出控制之法，这些都显示了我国在人口管理上的重要成就。

与以宏观经济管理思想为主流派生的另一个基本线索，即干预主义与放任主义思想并存。即干预主义思想一直占着主要的地位，但放任主义也始终以不同形式存在着，并且通过各种渠道互相交融与互相冲击。从管理思想史发展的脉络

看，西周时期干预主义属于主要倾向，行政上的等级管理制度，“九职任万民”的职业划分制度。市场管理与财政管理原则，都反映了这一点。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形态发生变化（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转化）和争霸的政治需要，在管理上出现了多元化的管理模式。秦王朝施行的是干预主义经济政策。到汉初，虽然高喊抑商政策，但黄老政治主旨在经济上是放任主义。这样，几十年的发展，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并生，汉武帝时期又是几十年的较为彻底的干预主义，控制生产与流通，虽然国用丰足，但是在更深层上影响了生产力的更大发展。盐铁会议后似乎产生了一种混合的经济管理模式，即以干预为主，辅以放任。如唐刘晏的宏观经济管理在发挥商人的作用方面高于前人，白居易也重视轻重政策，但却有不同于汉代的地方，即不抑商，而强调“四人之利咸遂”。北宋的李觏认为要富国就要“通轻重之权”，但是他主张给中小商人一方便，对他们实行寡息以资扶助。王安石的变法，酷似桑弘羊的改革，但仔细分析，王安石新法多注意于生产过程，而桑则在流通领域心计过多，同为干预，前者的放任因素多于后者。明代的丘濬其放任思想更为明显，主张“安富”，反对抑富，反对盐茶专卖，主张“任民自煮”，不但主张国内商品流通，而且主张对外贸易。至于明清之际启蒙主义思想家们，其放任主义思想就更为浓厚了。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是以宏观管理为基本线索，它内部孕含着干预主义与放任主义的撞击与交融。其总趋向似呈喇叭状，放任主义较之最初徐徐增大了，当然它还是在封建的生产方式内部的增大，在上层建筑允许的框架内的调节。学习中国管理思想史掌握这些基本线索，它对认识

经济管理规律的变化有所帮助，不至于被细小经济现象的变化迷误了自己的眼睛，也不至于看到差异的变化而失去敏锐的观察力。

说宏观管理思想属于主要地位，并不等于说微观管理思想无甚可言。但是它与宏观相比较之微弱则是事实。它的发展道路大体沿着商业管理→混合管理→地主阶级家庭经济管理→具有近代色彩的企业管理的轨迹向前发展。

我国的微观经济管理的古老概念即治生之学，由于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商业资本异乎寻常的发展。其特点多是利用地域差与时间差的长途贩运，它的风险大，利润多，需要一套经营之术，所以这时的微观经济管理多表现为商人的治生之道。如范蠡的十九年之间，三致千金。子贡往来于齐鲁之间，由于资本雄厚达到了与诸侯“分庭抗礼”的程度。被司马迁称之为“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善于预测，“乐观时变”。到了秦汉时则出现一些“以末致财，以本守之”亦农亦商的商人兼地主。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所叙的“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大体皆是。蜀卓氏既“用特致富”，也有“田池射猎”之地，孔氏不但“大鼓铸”而且“规陂池”；还有宣曲任氏赚了大钱“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他们都有可贵的微观管理经验值得总结。到了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庄园经济发展了，作为地主阶级的管理学《四民月令》、《齐民要术》也就产生了。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末清初，张履祥的《补农书》，张英的《恒产琐言》则言如何选择剥削对象，如何“抚御”佃户，如何积累，就不是一般的闲言碎语，而带有理论色彩了。

鸦片战争以后，特别七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半殖民地性质日益加深，各个阶级都面临着新的选择，反映在经